

經典考據與晚清「經世」思潮： 以孫詒讓及其《周禮》研治「經歷」為中心

徐佳貴*

以往關於晚清「經世」思想的討論，往往依附於凸顯漢宋、今古之分的「學派史」書寫範式，或將之等同於具體的變革建議與「政策」分析。本文以晚清治經家孫詒讓研治《周禮》、著書立說的經歷為線索，意在強調，「經世」是一個在時政刺激下，將「學」提升到「政」的層面從而予以合法化的「套語」，本有超越學術派分的性質；它誘使士人對於王朝興替、政制變遷作出「學術化」的解釋，而這套由學及政的「思維模式」，也直接影響到「學」本身的命運。清代經典考據之風相對科舉「正途」，規模始終有限，而在觀念上，「士」亦始終以「仕」為原則性的目標，致使「政」「學」難以兩分。但經典考據雖有研求精密之「學」，以探求精確之「政」的期許，終卻只能以一種去精密化的形式進入「經世」語境，經典不言自明的正當性之下是始終曖昧難明，又始終難以回避探討的「實用性」。晚清西力東漸，西學西政自身的源流漸為士人所體認，經典復從正當性之源泉的一面退卻；治經之士固可基於自身訴求，置身經世浪潮，可經學與對經世之道的闡發終被視為歧出兩路，「所學」已然無關「所用」。結合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聯絡地址：200433 中國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220號復旦大學歷史學系(No. 220, Handan Rd., Yangpu Dist., Shanghai City 200433, China)。

時人表述與表述的社會形成機制，「經世」一語所指涉的近代觀念變遷，或可由此得到較前更直觀也更為立體的呈現。

關鍵詞：經世、經典、考據、孫詒讓、《周禮》

關於中國歷代及晚清時期的「經世」思想，學界已有不少探討，其中較多依託人物個體或群體，進行「就思想論思想」的爬梳分析。¹據前人考證，至明末清初，「經世」一詞似才廣為流行，但其近義詞，如「經濟」、「經綸」、「經國濟世」之類早已成為常用語，故今人論及歷史上的經世思想，時段也不總限於明清以後。²但這又帶來一個問題：既然類同概念如此之泛，相關研究的視野邊界又在哪裡？筆者以為，不應對「經世」的意涵作非歷史的收束，而可以個案為中心大略劃定一史料邊界。本文選取的案例是晚清學者、浙江省瑞安縣士人孫詒讓(1848-1908)及其賴以成名的《周禮》學著述，因孫氏未在京滬廣等地長期活動，通常不會居於所謂「經世思想家」之列，故似可用以分析清季經世思潮更顯「常規」的一面。在另一面，孫氏作為著名「學者」，其人其書在「學術史」脈絡中卻已多有探討，³故筆者大致僅以孫的相關「經歷」為線索，對晚清「經世」思潮中傳統學術變遷的某些面相作一補充性的考察。⁴

本質上講，所謂「經世」雖可稱「思想」，卻並非指一種特定的思想「體系」。因儘管從來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學而優則仕」，可在後世一直存在大量「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情形。⁵《漢書·食貨志》在定義士農工商「四

¹ 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其他就單個人物論述經世思想的專著論文更是不勝枚舉。

² 參見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入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88。

³ 參見胡珠生，〈《周禮正義》稿本探略〉，收入《孫詒讓紀念論文集》(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1988)；葉純芳，〈孫詒讓《周禮》學研究〉(臺北：臺灣東吳大學博士論文，2006)；王更生，《籀廬學記——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第1冊(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孫氏的《周禮》學著述有《周禮正義》、《周禮政要》、《周禮三家佚注》、《九旗古義述》等數種，限於主題，本文僅涉及《正義》與《政要》，而以《政要》為主。

⁴ 曾有研究者探討清末「古文家」，即古文經學派的「經世」學風(只是「古文家」一詞易引起歧義)，也曾提及孫詒讓，但主要以更晚的章炳麟、劉師培、鄧實等國粹學派或排滿派人物為主，見羅檢秋，〈清末古文家的經世學風及經世之學〉，《近代史研究》，第6期(北京，2001)，頁21-54。

⁵ 如王爾敏先生更是通過考析上古「儒」的本職尋求「經世」思想的淵源，見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收入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北京：社會科

民」時即稱「學以居位曰士」，⁶士為「四民之首」，同時又可為官員，其地位大約處在「君」與(其他)「民」之間。宋代「士」的概念不復有上古中古的貴族與門閥氣味，且科舉制臻於完善，官僚隊伍明確以崇文抑武為原則，以「文」或「學」進身遂成為讀書人一種制度化的人生選擇。因掌握經史知識獲得參政議政之權，其關涉「經濟」的思路，即是由「學」及「政」，王朝興亡的原因不僅可以歸結到「政風」，且可進一步歸結到「學風」，最典型的便是近世以來「宋亡於理學之空談，明亡於王學之空疏」之類的觀點。這些觀點恰當與否另當別論，但由此可見，參照學理參與政制規劃及實施，乃是一種基於現實制度安排的職能期許，乃至參與形塑了士人同時包含「學」「政」兩方面的階層認同。這種超越學術派分的集體認同，也對晚清士人的思想與經歷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⁷

進言之，今人談及經世思想，往往專就著書立說，即「立言」一面展開，而為官施政，或為紳衿入幕及在鄉參與地方管理(即「立功」)的一面則稍帶論及。然而，對士人事功的考察往往是將所立之言向後延伸，而這裡則須探察「立言」的種種前提——科舉取士制度以及其他為世公認的成名與上升途徑。中土傳統經典在其中，亦同時作用於「言」之內容與作為條件的士人的自我實現之路。總之，圍繞「經世」、「經典」與「士人」的這番討論，或可藉以拋磚引玉，幫助今人對既有的晚清思想史或學術史範式

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26-43。

⁶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24，〈食貨志第四上〉，頁1118。

⁷ 與「政」、「學」並舉或對舉的尚有「藝」、「教」等詞，這些詞的意義或分離或重合，在歷史場景中的運用十分複雜。如「學」的概念或高於「藝」(如下文述及的張之洞《勸學篇》中的用法)，或與「藝」為同義詞；「政」與「教」有時是兩個詞，但又時常連用，而在「禮制」、「禮教」之類的問題上兩者的區別往往又甚模糊。限於主題，本文對「藝」、「教」等詞不予專門討論。至於「政」，則主要指典章制度與行政施政的方法，而傳統上有時「政」「治」連用，似也多指「行政」(statecraft/administration)，而非今義「政治」(politics)。關於晚清近代意義上的「政治」與作為學科的「政治學」的形成過程，參見孫青，《晚清之「西政」東漸及本土回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該書已指出傳統之「政」較近代「政治」概念意涵更為寬泛；但二者亦非取代與被取代的關係，statecraft/administration意義上的「政」晚清亦廣為使用，而本文主要討論的便是這一意義。

作出某些更具發散性的反思。⁸

一、「經世」語境中的父輩學術取向

今人論及 19 世紀中國學術史，「今文崛起」與「漢宋調和」是兩塊必然出現的內容。⁹對於後者，錢穆先生早先指出：「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行於全國，而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¹⁰然在另一面，曾國藩等湘人鼓吹宋學的淵源又被上溯至方、劉、姚等皖人開創的桐城派。而 19 世紀中葉倡言宋學者大有人在，與唐鑾、曾國藩等關係較密者，尚有河南李棠階、倭仁(開封駐防蒙古旗人)、雲南何桂珍、安徽吳廷棟等人，只是曾氏後來回鄉創建由書生分級統兵的湘軍，令湖湘士人聲名大振，才連帶突出了「湘人」與「宋學」的關聯。事實上，早先京師才更有資格被視為一個形成「潮流」的關鍵地域，不同取向的學者在此通過發表言論、發展士林人脈，實現學界話語權的消長。上述唐、倭、曾等人便是京師士林的活躍分子，在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前，他們即已形成一個鼓吹桐城義法、倡言理學的「圈子」，孫詒讓的父親孫衣言(1815-1894)便一度置身其中。來自浙江省瑞安縣(隸屬溫州府)的他於 1837 年拔貢，1838 年至京師，以準備下一步的科舉考試(順天鄉試與會試)。在京期間他結識了邵懿辰、梅曾亮、孫

⁸ 為免淆亂，本文中的「經典」僅指「經部原典」，沒有代指其他部類典籍的意涵。

⁹ 按清時的「漢學」與「宋學」，乃至「考據學」等名稱是否恰當，時人與今人都提出過不少意見。同樣地，許多人已指出清中前期即有不少漢學家標舉宋學，標舉宋學者亦采漢學一脈的治學路徑，而在「漢宋之爭」中，部分當事人有很強的門戶之見，代表性值得商榷。有人專門分析乾嘉時期「爭」與「不爭」並存的狀況，參見周積明，〈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清史研究》，第4期(北京，2004)，頁1-18。而孫詒讓雖以漢學路數治經，卻也說過：「讓年廿四，謁南皮師於京邸，同坐有盛譽宋學者，南皮砭之云：『今天下大病在於不學，倘其能學，便是佳士，遑問其為漢、宋乎？』竊服膺斯語，以為通論。」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470。

不過，鑒於這些詞確是晚清仍在使用的概念，且據筆者所見，目前還沒有更合適的新詞取代它們，故在本文中仍將沿用。另外，戴(震)姚(鼐)、江(藩)方(東樹)之爭等確曾被時人理解為「漢宋之爭」的標誌性事件，之後力主調和的許多人即是依此立論，故本文仍將其作為「歷史觀點」引用。

¹⁰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638。

鼎臣等標舉理學的名士，對京城的學術風向有了切身感受。¹¹1841年，同樣在京的衣言二弟孫鏘鳴中進士，1844年授翰林院編修；1850年衣言自己亦中進士、入翰林，曾國藩即為他的讀卷師之一。¹²之後在京為官，孫與曾氏多有來往，且與倭仁同在上書房當值二年。受此氛圍薰染，「後世儒者之學，莫粹於程子、朱子」便成為他論學的一種基本取向。¹³

有論者指出，晚清京師理學圈子內部也非渾然無別，可分為以倭仁等為代表的「修身派」與以曾國藩為代表的「經世派」。¹⁴只是「修身」與「經世」、「內聖」與「外王」本有遞進關係，標舉理學者且多強調注重「內修」方能真正做到「經世」。「經世派」的曾國藩早年記問學於唐鑾事，唐便說「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¹⁵曾氏自己在桐城先驅「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提後又專門標出「經濟」，對應孔門四科，「經濟」對應「政事」之科，但又說：「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¹⁶後來曾氏組建湘軍對抗太平天國，浙江溫州雖僅樂清一縣曾為太平軍攻佔，但內部則發生過紅巾軍、金錢會等起義，衣言弟鏘鳴在鄉，亦聯絡地方士紳會辦團練，參與鎮壓。孫衣言在外，做到安徽(兼署)、湖北、江寧布政使，隨曾國藩參與各地戰後統治秩序的重建工作，在此經歷基礎上便也有了某種由內及外、「修己及人」的見解。如他曾說：「十餘年來，士大夫洵更喪亂憂患之餘，漸見本心，而內外鉅公亦有以身心義理之說為之倡者。」¹⁷而施政地方，亦須強調內(本心)與外(治術)

¹¹ 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頁4、5、8。

¹²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12、15。

¹³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蘇菊村墓表〉，頁347。

¹⁴ 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96-201。

¹⁵ 《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第7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上，〈問學〉，頁17950。

¹⁶ 《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問學〉，頁17963；《曾文正公全集·雜著》，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第6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4，〈勸學篇示直隸士子〉，頁17285。

¹⁷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十家語錄摘要序〉，頁457。

的本末之別，官吏若單有「才」只會熱衷鑽營，而「不肯用之於百姓」，「故曰才不可恃，亦恃有其心而已。」¹⁸

在另一面，孫衣言雖認同曾國藩等「一宗宋儒，不廢漢學」的態度，¹⁹卻又依託鄉土資源，意欲增補司空見慣的「宋儒」之系譜。詒讓曾回憶父親在京，「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為欲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²⁰宋代永嘉之學大致對應的地域範圍即是溫州，可它雖屬於廣義上的「宋學」，由於「衰微」已久，納入宋學範圍的情形相當少見。之後交遊漸廣，外放地方，衣言便與子詒讓、門生黃體芳等全力搜羅各地鄉賢遺籍，刻成一套《永嘉叢書》四處送人，以期「永嘉」之名在官場士林廣為流布。²¹

至於南宋永嘉之學與程朱一脈的差異，孫衣言亦未全然回避，反對此有所發揮。前人有言，開始「自成一家」的永嘉名儒薛季宣，「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後經陳傅良至葉適，永嘉「功利」之說「始一洗之」，²²然相對朱陸之精於「內聖」之道，永嘉諸儒顯更講求「外王」經世，故其學也始終有「經制」之名。孫衣言借此進一步強調內修與事功間的「平衡」，欲令世人如葉適所申說的那樣，明白「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彌綸以通世變」。²³總之，在依託程朱、遵循「由內及外」的思路之餘標舉「永嘉經制之學」，乃是一種在既有的論學環境中變，傳統學術「派分」自身的靈活性，首先於此可見一斑。

「經世」訴求務必有所依傍。孫衣言承認「經」在群籍中的首要地位，

¹⁸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程宰送行序〉，頁503。其弟孫鏘鳴至晚年亦曾說：「近來重漢學，薄宋學，人心風俗壞矣。」見孫鏘鳴，〈家訓隨筆〉，收入胡珠生編，《孫鏘鳴集》，上冊（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頁266。

¹⁹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第5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20，〈覆穎川府夏教授書〉，頁14831。

²⁰ 孫詒讓，〈良齋浪語集敘〉，收入許嘉璐主編，雪克點校，《孫詒讓全集·籀廬述林》（北京：中華書局，2010），附錄，頁342。題下注「代家大人作」（頁341），即代其父衣言而作。

²¹ 關於《永嘉叢書》的刊刻流傳，參見吳佩娟，〈孫衣言及其《永嘉叢書》研究〉，《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1期（臺北，2008），頁165-180。

²² 黃宗義、全祖望，《宋元學案》，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690、1738。

²³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敬軒先生行狀〉，頁357。

只是研治之法須以宋儒為宗。如在 1882 年致門人黃體芳的信中稱：「近來言經學者，專於文字訓詁用心，恐非經之本意，且於立身濟世，皆無致用之實，……鄙意以謂仍當以胡安定經義、治事為兩大端，而兼治史學時務，使學者通今知古，了然於得失成敗、邪正賢奸之辨，則人才必當稍異於前矣。」²⁴又曾說：「漢興，老生宿儒頗復收拾遺經，又名以師授，自立異同，而皆未能深明聖人之道，以正一時之人心。……戰國之士，意主於畔經，而謂經之為道不足以治天下；今日之學，名托於尊經，而使經之為用不足以治一身。其言經不同，要其以經為無用則一也。」²⁵其弟孫鏘鳴亦云：「蓋聖人之立言垂教，其道莫著於經。」但與其兄不同，他認為「文字訓詁之未明，曷由進而探性命精微之旨。」²⁶調和漢宋的意味更為明顯。另外，他還曾對《易》有過依照樸學路數的專門研究，²⁷相比之下，其兄衣言雖稱「經」可以「有用」，但對於經典本身則似乎甚少著力。

實際上，早先如清中葉的章學誠，在標舉「浙東學術」時即凸顯史學：「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²⁸晚清溫州平陽人宋恕後論及岳父孫鏘鳴的學行時也標出「浙學」，稱：「浙學故重史，而永嘉為最。」²⁹南宋永嘉學人如陳傅良、葉適等素喜論史，孫衣言步武鄉賢，亦喜閱史及永嘉諸儒的史論，作有不少劄記，涉及吏治、財政、兵事、文教等各方面。³⁰而除卻地域性的建構，廣而言之，如曾國藩一方面秉承自顧炎武以來至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的看法，將這一訴求歸於「禮學」，並將清代顧炎武、江永、秦蕙田等治經名家編入此禮學系譜，³¹還

²⁴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00。

²⁵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黃岩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頁479。

²⁶ 孫鏘鳴，〈惜陰書院課藝序〉，收入胡珠生編，《孫鏘鳴集》，上冊，頁29。

²⁷ 見孫鏘鳴，《周易釋義》，收入胡珠生編，《孫鏘鳴集》，上冊，頁326-385。

²⁸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523-524。

²⁹ 宋恕，〈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325。

³⁰ 參見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47-48、68-69。

³¹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第4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3，〈孫芝房侍講芻論序〉，頁12750-12751。

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為「三禮」之首，「自體國經野，以至……各有專官，察及纖悉。」³²但具體到如何究心「經濟之學」，他則明言：「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³³另外他還曾說：「莊生有言：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行周於魯，猶推舟於陸也；古今之異，猶獫狁之異乎周公也。」³⁴同為湖湘士人的郭嵩燾，亦對《禮記》中的「時為大」一語有所闡發，稱：「時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襲也。生乎今之世，復古之道，則與時違矣。」³⁵

這種在經史之間的態度，或不應只理解為是一種「學派」特徵。一方面，晚清各「學派」中人功名與仕官的情況多樣，對現行科舉制的認可度也不一致，可由於科舉始終以程朱理學為宗，「宋」較之於「漢」一向有更為廣闊的社會基礎，只是在預設「門檻」的學術史家看來，清代相當一部分時間裡宋學一面顯得「竭而無餘華」，未可稱「學」（或未可編入學界「名人譜」）而已。在另一面，後來亦有標舉其他學術旗幟的士人持類似看法，如標舉今文經學的魏源代擬《清經世文編》序，開篇卻謂「昨日之曆，今日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³⁶而倘若脫出此類預設門檻的「學派史」的局限，我們或可先從涵蓋更廣的文化養成與閱讀興趣的意義上理解前引的這些論述。具體來說，仍須簡單梳理傳統經典在取士制度中的存在狀態——尤其對於那些並未以「治經之士」名世者，如曾國藩、孫衣言等均在此列。

眾所周知，清代科舉大體上是承襲明制，其中科試四書義與經義均用時文八股。相關應試書籍的流行，使得經典雖名為科考的核心內容，士子主要的揣摩對象卻是時文選本而非原典。不僅如此，到清乾隆末年，一般鄉、會試首場僅試四書義三篇及五言八韻詩一篇，「經義」被挪到了第二場。

³² 《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2，〈筆記〉，頁17085；《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孫芝房侍講窮論序〉，頁12749-12750。

³³ 《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問學〉，頁17964。

³⁴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8，〈覆郭筠仙〉，頁13648。

³⁵ 郭嵩燾，《禮記質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354。

³⁶ 魏源（代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敘〉，收入賀長齡、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1。

自明以來，鄉、會試三場重首場的風氣一直存在，³⁷至此宋代才開始定型的「四書」（且其中《大學》《中庸》出自《禮記》一經），遂得以確立其制度上之於其他經籍的優先地位（當然在闡發「四書義」時，亦可用到其他經籍的內容）。而經典在清代育才取才制度中固然居於最醒目的地位，其整體的存在狀態，卻也流於高度的簡化與程式化。³⁸

具體到本文的例子，傳統典籍經由制度性力量「過濾」，方與士子發生聯繫的關聯模式亦是顯而易見的。據稱孫衣言、鏘鳴兄弟幼時在鄉「治舉業」，「師例禁閱子史、諸集及朱(熹)、蔡(沈)等外經說。一日，兄弟從他所見《易知錄》，大喜。《易知錄》者，史略之尤略者也。則假歸私閱之，師察見，遽施撲，士皆正師。」³⁹地方科舉教育之恪守程朱一脈經說，可見一斑。而制度上的「尊經」本身，也僅是促成了經在一般言說中的不證自明的神聖性，其與「經世」的具體關聯，則未能由此變得清晰。故曾國藩、孫衣言等雖可泛泛而論經的重要性，倘涉及致用之方，則多從自身的「知識倉庫」中採擷時段較近的史部資源，以後世政事及本朝典制為憑藉。至於經典本身關於「因時變通」的記錄，則多僅視為其「向後看」的正當性之來源。

當然，在某些場合，經史之間的界線亦可不甚分明。因「史」本非部類概念，取其在上古時代「記錄」或「記言記事之官」的意義，則經亦可以是史；若取一種更徹底的邏輯，將經理解為「先王之政典」，甚而可謂「六經皆史」。據筆者所見，《尚書》、《周禮》與《春秋》（或《春秋左傳》）即是常在這片經史間的模糊地帶出現的經典，且相對《儀禮》《禮記》，原稱《周官》的《周禮》更是提供了一整套繁密的設官治國的方略，以至被推為「三禮」之首、「政書」之祖。與孫衣言切近的例子，即是南宋永嘉諸儒在重史

³⁷ 參見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3、38、40。

³⁸ 此處的「程式化」指取士制度對經的安置，亦依從某種特定的、但簡化了的學術路徑（即簡化了的程朱理學）。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曾指出清代漢學風潮對科舉的滲透，但這主要體現在第三場策論上，見艾爾曼，〈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譯，《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58-181。

³⁹ 宋恕，〈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325。

之餘，對《周禮》也頗為關注。就此而論，傳統經典固未成為孫衣言知識倉庫的醒目部分，可下輩人在經史之間作出不同選擇，他也可以從經典不言自明的神聖性，以及經與史的某種相通性兩個層面順水推舟，予以認可。⁴⁰

如章太炎後來在《孫詒讓傳》中稱，孫衣言曾對兒子有這樣一番訓導：「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群盜為奸劫，則賊善人，甯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回答：「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風義矚然，經舉之以徒舉一二人僻衰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於是衣言授以《周官經》，「其後為《正義》，自此始。」⁴¹詒讓之子孫延釗的說法與此有所不同，其所撰《年譜》稱：「(衣言)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經》特為精詳，大抵闡明制度，窮極治本，不徒以釋名辨物為事，亦非空談經世者可比。因於四子書外，先授詒讓以此經，藉為研究薛、陳諸家學術之基本。」⁴²二者可能都是實情，父子不同的閱讀與研習興趣，被孫衣言納入到同一種「經世致用」的期望之中。⁴³不過，關於學經次序，南宋朱熹曾明確反對自《周禮》入手：「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卻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⁴⁴孫衣言雖大致認同朱熹「內聖」方能「外王」的思路，在此卻「靈活」地作了調整。當然，他本人的期許，當是治經仍「以宋儒

⁴⁰ 據稱孫衣言在詒讓幼時曾作詩相與，稱「他日讀書毋效我，陰何鮑謝總支離」。見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2。詒讓的哥哥孫詒穀1862年在迎擊由處州入瑞的太平軍時戰死，年25歲，在殯志中孫衣言說：「兒少而慧，寡言笑，與人常若不歡，及長，織書喜生殖，始為諸生，即棄科舉業而多聚兵書，予頗憾之。」見孫衣言，《遜學齋文鈔》，〈七兒貽(詒)穀殯志〉，頁341。這也說明孫衣言對孩子們的閱讀興趣雖有不滿，卻也未強求他們與己一致。

⁴¹ 《章太炎全集》，第4冊，《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孫詒讓傳〉，頁212。

⁴²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6。引文中的稱呼應為整理者所改，非孫延釗原文。

⁴³ 另有記錄謂孫詒讓「幼時隨宦」，父親問他：「汝喜讀何書？將來治何書？」詒讓對曰：「《周禮》。」衣言曰：「《周禮》難讀，漢學家多譏為偽書，汝豈能斷此公案？」詒讓曰：「因難解難斷，是以專治。」見劉成禺，《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125。

⁴⁴ 《朱子全書》，第17冊，《朱子語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86，頁2911。

為宗」，而詒讓窮廿七年(1872-1899)之力治《周禮》作《正義》，其中卻無多少義理或致用之道的發揮。孫衣言於 1894 年去世，他對兒子的這一治經成果終將如何置評，而今似也無從推斷了。

二、經典考據與「經世」

如前所述，從孫衣言到孫詒讓，表面看去似是由「宋」返「漢」。在以往的學術史表述中，與「經世」掛鉤的「漢學」通常是指「今文經學派」，而孫詒讓所治之《周禮》無疑屬於古文經。倘施以嚴格的「學派史」視野，孫氏此舉只能算「逆流而動」。然而，查究晚清今文經學的興起與播遷，與其說這確是「漢學」內部的一種新「派別」，不如說是一批相對為人忽視的典籍資源開始重獲重視。⁴⁵而據筆者所見，這批資源對於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則無多少影響——儘管其中浙籍學者戴望、俞樾等與孫衣言同在官場士林，交誼甚深。

實際上，晚清乃至晚清之前某些「學派」的所謂「升降盛衰」，即是在聯結「政」與「學」的時人或後人「表述」中方才得以顯現。而某些被認為是援經改制的事例，也會沉澱為一種士人的集體記憶，對關乎經典的價值評判產生直接影響。依託《周禮》改制，常為人提及的即有漢末王莽、西魏蘇綽、北宋王安石等人。劉歆設法將《周禮》升格為經，被許多後人與王莽改制造成嚴重社會動亂、以致國破身死的事實聯繫在一起，其中《周禮》或由此被目為「偽經」，或被認為雖屬真經，卻與新莽所施之政本不相關。北宋王安石標舉《周官》之「新義」，在當時及後來亦常被視作援經改制，反致禍亂。⁴⁶總之與今人不同，在具體案例中經學與政事是否有關、有何關聯，在士人的歷史記憶中往往不僅是事實判斷，且涉及對於經典古學

⁴⁵ 如最初莊存與、劉逢祿以至龔自珍、魏源，尚有連貫的家學或師承關係；可之後的戴望、廖平及康有為諸人之間，卻已難建立明確的傳承關係。另如杭州詁經精舍，今古文經均是研習對象，俞樾兼治《公羊》，譚獻標舉今文經學，而其學生章太炎明尊古文經學，崔適則主治《公羊》，一方面受其師俞樾影響，一方面似是後來受康有為影響。

⁴⁶ 關於晚清之前歷代《周禮》學的綜述，參見葉純芳，〈孫詒讓《周禮》學研究〉，頁16-48。

的價值判斷。而那些明指《周禮》為偽者，也多不否認周公制禮作樂，只是聲稱由於秦火燔燒等因，由其制定的真正美備的「周禮」業已「失傳」。也即「疑經」與「信經」出於近似的思路——同樣基於對真經的尊奉乃至「信仰」。對於那些信經者而言，援經改制何以出現如此嚴重的問題，又是下一步務必考慮的。由「政」再返於「學」，對治經「方法」便當有所檢討。

如南宋永嘉學者陳傅良便曾說，王安石等改革者「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斫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他在這段話之前提示矯正之方：「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⁴⁷也即對經不可拘於「薄物細故」的考證，應以闡發個中「大指」為主。其同鄉葉適亦云：「（《周禮》）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⁴⁸朱熹亦以為《周禮》雖可「全信」，卻未必是周公「自作」，大綱「是周公意思」，小處有謬，周公可能「未及改」。《周禮》在周時便「未盡行」，那麼對於細處本就不必拘執。⁴⁹然而，就是被這些人視為反面教材的王安石，其實也說過古聖王「施設之方亦皆殊」，對「先王之政」應僅是「法其意而已」之類的話。⁵⁰只是其主抓的「意」，難為時人後儒認可，而後儒闡發的主旨又言人人殊（如陳傅良的《周禮說》即為朱熹多所指摘），⁵¹對於先王「遺意」所依憑的施設之方，後儒仍難免各憑己意採擇發揮。

宋代以後，這種「學」「政」雙重意義上舉世詬誶的「反面典型」似乎

⁴⁷ 陳傅良，〈進周禮說序〉，收入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頁505。

⁴⁸ 葉適，〈黃文叔周禮序〉，收入劉公純等點校，《葉適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220。

⁴⁹ 《朱子全書》，第17冊，《朱子語類》，卷86，頁2911-2912。

⁵⁰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9，頁410。

⁵¹ 《朱子全書》，第17冊，《朱子語類》，卷86，頁2915-2919。

便不再出現了。但明清嬗代之際，如顧炎武所謂「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⁵²即提示了另一種倡言經世的思路，強調對於典籍本身的精密研究。具體到上古典制的延續問題，他言及：「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跡，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⁵³所攻訐者又恰是那些「法其意」的前人，而「撥亂滌汙」的途轍，即是使經典展現的三代政法盡可能地恢復「精確」。當然，「經世」仍應為「通經」之旨歸，後來對「夷夏之辨」的強調轉向與現政權合作，有治經家乃至循此思路稱道漢代「以經術緣飾吏治」的傳統：「夫儒林不通達國體，經術不潤飾吏事，匪特學不足以經世，而其治之及於民者亦不能服教畏神而至於久遠。」⁵⁴在清代治經成就中，「禮學」正是重要一脈，由此，以空前精密的手段研治經典，便漸成一股「風氣」，至乾嘉年間，瀰漫於京師及若干江南城市。

問題在於，這種治經「方法」已更趨精密，因而尚需環境的支持。相對科舉制本身對經典的程式化處理，從事考據是士人與「四部群籍之首」建立更具能動性的聯繫的一種方式。而也正因為此，以科舉為鵠的的常規育才體制及其相應的書籍類型與流通規模，已難應對這一空前精密化的學術需求。於是，包括《四庫全書》等國家學術工程、較穩定的官方與半官方的贊助、部分書院兼具漢學研究功能，以及私人藏書樓的有限開放與使用，一系列配套建制相應而起，乃至有人把這一學術取向及相關治學環境的形成，稱為一種清代學者的「職業化」傾向。⁵⁵但反過來說，正由於其相

⁵² 顧炎武，《亭林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6，〈與楊雪臣〉，頁135。

⁵³ 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卷7，「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頁419-420。

⁵⁴ 惠棟，《松崖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三賢祠記〉，頁285。

⁵⁵ 參見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60-119。其中關於藏書利用問題，可參見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

對科舉的非常規性，從事考據者與參加科舉者仍不在一個數量級，而以考據成名者，較之科考中進士者亦顯然為少。⁵⁶且考據之風對清代取士制度的滲透，亦未達到宋代「荊公新學」及之後程朱理學的水準，故以治經為主的「漢學」雖在當時亦可被視為某種「潮流」，其流風所被，實屬有限。⁵⁷

至 19 世紀上半葉，此一「學術潮流」又越發受到來自「今文經學」與「宋學」的攻訐與挑戰。但查究具體情形，乾嘉時期戴震即強調闡揚義理，汪中乃至明言經世，焦循標舉「經學」之名而以「考據之目」為狹隘，段玉裁、凌廷堪等亦聲言學當以經世，卻往往是出於自身對「世道人心」的不滿，與其他「學派」的批評刺激似無多少關聯。⁵⁸而倘若剔除這些系譜中的「要角」，受指摘的不求經世的漢學「潮流」該是指哪些人、規模如何、表現是否一如那些批評者所形容，在以往的學術史書寫中卻又往往語焉不詳。鑒於考據之風實際規模有限，更合理的情形當是，「要角」已構成了「潮流」的主體，而此類指責首先也只是一種「表述」，用以標示自身異於某類往往帶有虛懸意味的「他者」的立場。如方東樹曾經依荀子「法後王」說立論，稱：「漢學諸人，堅稱義理存乎訓詁典章制度，……竊以此等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無關於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物有本末，是何足以臧也？以荀子『法後王』之語推之，則冕服車制祿田賦役等，雖古聖之

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但此書關涉時段較長，且重點似亦在明末清初。

⁵⁶ 某些漢學中人固是科場乃至官場中的成功者，如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及畢沅、阮元等人；也有一些科試並不順利，乃是經由種種官私援助推薦方得出人頭地、享譽海內，最著名者即江永、戴震、汪中等輩。後江藩著《漢學師承記》，自承便是「以備國史之採擇」，因「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頁4。具體到該書內容，對於漢學家如何受官方肯定、受時人稱許亦多所著墨。通過編訂學人「系譜」的方式予以弘揚，正可表明士人借此自我實現的難度。

⁵⁷ 今如艾爾曼、葛兆光等學者已指出，所謂「漢學」在其最盛的乾嘉年間，也有顯著的地域性，所謂「漢學專制」之局嚴格意義上講從未形成，只是部分江南漢學家及漢學的「提攜」者在京師、省城等帝國核心地域甚為活躍，才使之具有了某種「主流」的意味。參見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葛兆光，〈十八世紀的學術與思想——評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收入葛兆光，《域外中國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2-4。

⁵⁸ 這些乾嘉學者的「經世」言行，參見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頁69-74。

制，亦塵飯木齒耳。……三統之建，忠質之尚，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聖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後世，而欲追古制乎？」⁵⁹值得注意，此處的「堅稱」亦可提示從事經典考據者自身亦強調考據之對象的現實性，只是方氏標舉「古不可復」論，從而不免以這一同在「政制」與「治術」層面的預判否定他人的治學實踐。

另如龔自珍以為：「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前朝之「治」及「學」與本朝本不相關，而「後世之師儒」「生不荷耨鋤，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⁶⁰即「古法不可用」本是他的預判，故在他看來，正是某些學人「學以經世」的表現——「援古刺今」，反有礙於其在本朝的「君」「民」之間履行「本職」。

至 19 世紀中葉，則有孫鼎臣等逕視漢學為釀成太平天國起義的「罪魁」，他說：「天下之禍，始於士大夫學術之變。楊墨熾而諸侯橫，老莊興而氏戎入。今之言漢學者，戰國之楊墨也，晉宋之老莊也。」⁶¹查究始末，這些意見與其說是基於學術史「內在理路」的「物極必反」，不如說是王朝漸呈亂象時，「經世」作為一個將「學」上升到「治國」層面、從而使之合法化的「套語」越發受到重視，乃至反過來誘使時人對於王朝亂象作出某種「學術化」的解釋。相應地，至於此後經典考據是否便走向「衰微」，今已有人指出，太平天國戰爭使得江淮一帶「書籍文物蕩然無存」，可江淮當地還有吳大澂、儀征劉氏祖孫等繼續以此路數治學，浙、粵、湘等省亦有一批「同道」（如俞樾、黃式三、黃以周、陳澧、王先謙等）。只是標舉其他學術旗幟者已參與話語權的分享與爭奪，從事考據的物質基礎也確有進一步削弱，在國勢日蹙、且眾聲雜遝的氛圍中，便易產生此種過於脈絡化的某

⁵⁹ 方東樹，〈漢學商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165-166。

⁶⁰ 《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乙丙之際籌議第六」，頁4-5。

⁶¹ 孫鼎臣，〈畚塘芻論〉（咸豐九年（1859）刻本），卷1，〈論治一〉；徐珂，〈清稗類鈔〉，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824。

一「主流」「衰微」的表述。⁶²

與當時其他標舉宋學者類似，孫詒讓之父孫衣言指責清代治經家從事考據，反形成以「經」為無用的「風氣」。但衣言在官場士林的友朋中，亦有劉壽曾、劉恭冕、俞樾等考據名家，這些交誼也多為孫詒讓所承續。⁶³同時，乾隆年間得中探花的瑞安人孫希旦曾作《禮記集解》，衣言一面稱「其於程朱之說，尤篤信之。」一面又稱「其於諸經，尤精於三禮」，⁶⁴以其位處漢宋之間，故也是一則可藉以認可詒讓治學取向的成例。而進一步講，孫詒讓以「考據」之法治經，一面基於自身興趣，一面有外部環境的作用，只是需要指出，這一「外部作用」亦非指向學術「派別」的升降，而當從社會制度層面予以全面的考察。

首先是反面的考察。詒讓之父衣言雖認可兒子從事考據，但對其科舉仕進之路同樣充滿期待。如他曾在自家族譜的賢秀表序中說：「科第仕進之說雖出於流俗，而光耀門戶實必賴之。……我孫氏自沅州府君以進士起家，吾兄弟又皆以甲科策名盛時，諸父兄子姓輩又累累遊饗序、舉鄉闈矣，詩書之澤雖遠而復興，後之人當思所以光而大之。」賢秀表之作，「使我子孫知科名仕宦未足為賢，而欲有所建立以光前人之業、樹後人之望，又未嘗不出於仕宦科名，要之，以學行為本。」⁶⁵且「士」理應謀求「用世」，不然不免於終生抱憾：「若夫有用之才，具用世之志，又當用才之時，而不能少假以柄，展其蘊抱，……徒令其踳伏於大山窮谷，深曠熟視，謠嗟太息，以自寫其幽憂之思、不平之論，至其饑寒困迫，忍垢蒙辱，蓋無異於里巷之鄙夫也。」⁶⁶總之，士人做到「達」方可「兼濟天下」，而科舉仕進即是士子求「達」的不二正途。

只是，詒讓在科場中的表現未能如父所願。1867年中舉後，自1868

⁶² 參見王惠榮，〈從晚清漢學區域之發展看漢宋調和〉，《安徽史學》，第2期(合肥，2009)，頁26。

⁶³ 關於孫氏父子學林人脈的集中論述，參見李海英，《樸學大師——孫詒讓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頁28-56。

⁶⁴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敬軒先生行狀〉，頁356。

⁶⁵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134-135。亦見陳偉玲整理，〈盤谷孫氏族譜〉，《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第1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284。

⁶⁶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書林亨甫望山詩續後〉，頁458。

至 1894 年，他八次進京會試均告失利，僅是乙亥年(1875)六月通過山西賑捐得了個「刑部主事，充福建清吏司行走」的職銜。這次賑捐可能出自父親的一手安排，因四個月後詒讓即「乞假出都」，做官的事也便沒有了下文。⁶⁷1887 年他還在某時文刻本上題詩二首，中謂：「兔園秘冊枕中儲，翔步公卿百不如，一代右文珍腐臭，廿年稽古任軒渠；」「探囊簡練得陰符，巧說表詞利祿途，樸學寧辭嘲狗曲，小言強效賦蠅鬚。」⁶⁸對孜孜以求科名仕進的譏諷可謂不遺餘力。這種科場失利與不滿科舉二者間的「惡性循環」，使得詒讓最終放棄了考試，1894 年會試報罷，他便不復入都，而這似也與當年父親去世、再無人「催迫」直接有關。

然而換個角度觀察，也正是父親衣言中進士、入翰林、之後布政地方的經歷，使得孫詒讓擁有寬裕的經濟能力、較廣的官場士林人脈，從而為其治學貢獻了「正面」力量。不單如是，1850-1860 年代的太平天國戰爭雖使江南及其周邊地區一度「斯文掃地」，可之後文教秩序的恢復尚較迅速。當時的金陵官書局學者雲集，孫衣言亦在其中。同時由於戰亂，「故家遺書往往散出。」加上「海東舶來，且有中土所未見者。」⁶⁹孫詒讓隨父游走江淮，搜求古籍秘笈，並曾到上海等地採購日本所刊中國已佚舊籍，這一切便構成了之後在鄉興建孫氏藏書樓——瑞安玉海樓的基礎。詒讓後來自稱：「某自出家塾，未嘗師事人；」俞曲園(樾)「於舊學界負重望」，又與父親衣言交好，「然亦未嘗奉手請業。」個中原因，「蓋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學者能自得師，固不藉標揭師承，以相誇炫也。」⁷⁰說到底，其父衣言正是詒讓的頭號「學術贊助人」，他做官期間攢下的財力與創造的社會條件使詒讓擁有了「四部古籍具在」的良好環境。⁷¹後來顧頡剛曾從《世載堂雜憶》

⁶⁷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125、128。

⁶⁸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32。

⁶⁹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85；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玉海樓藏書記〉，頁487。

⁷⁰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350。

⁷¹ 另如清前期的江蘇元和惠氏，祖惠周惕初舉博學鴻儒科，後中進士、入翰林，父惠士奇亦中進士入翰林，而惠棟科考不順，僅是生員，但父祖兩代已為他的漢學研究營造了必要的客觀環境。當然，惠家素重古文經學，兼崇程朱，這一點與孫氏父子的宋漢之別有所不同。

中引到一則某「孫氏姻戚居鄂者」論詒讓著書的經過，稱：

仲容得美婦，能文，善治事，侍仲容居樓上，七年未出門。樓惟夫婦能登，外無一人敢闖入。樓上置長桌十餘，每桌面書卷縱橫，稿書錯雜，丹黃墨漬，袍袖卷帙皆滿。寫何條注，翻何書籍，即移坐某桌。日移坐位，十餘桌殆遍。篝燈入睡，桌上書稿，夫人為清理之。外人只知仲容閉戶著書，但不知所著何書。七年後，始知與夫人孜孜不倦者即今日鄂刻之《周禮正義》也。

對此顧氏評論道：

孫衣言兩任藩司，一江寧，一湖北，腰纏累累，詒讓在其蔭育之下，讀書、生活均無問題，性本聰敏好學，得斯無憂無慮之環境，而又配以佳婦，代為安排著作生涯，故能有此偉大成就，為近百年稀有人物。⁷²

此一傳聞確否姑且不論，可顧氏作為標舉「為學術而學術」觀念的近當代學人，對於「無憂無慮之環境」的「有益於學」，應當深有感觸。⁷³

問題在於，顧氏下文提及王念孫、段玉裁的為官經歷對治學的「幫助」，可知「封建時代成學之難」；廣而言之，至 19 世紀中後期，學人的治經成果亦須在官場士林，而非已然獨立的「學術界」中接受檢驗。故此時治經之士面對「政」「學」關係問題，仍無「為學術而學術」之類的觀念可為解脫。如以治經與諸子稱名當世的俞樾，即在多種場合在「政」的層面論及古學何以致用的問題。他稱荀子所法之「後王」本是「先王」中的「後王」，而之後的「後王」已不在此「先王」之列，故曰「古不可復」；⁷⁴在其他場合卻又曾說：「《孟子》之書言法先王，《荀子》之書言法後王，二者不可偏廢。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後王者法其法。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法其意也。荀子曰：欲觀聖人之跡，則以其燦然者矣，

⁷² 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頁125；《顧頤剛全集》，第2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10，〈讀書筆記〉，「辛丑夏日雜鈔」，頁72。

⁷³ 顧頤剛鼓吹「為學術而學術」最著名的文本，似即〈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大國學門週刊》，第2卷第13期(北京，1926)。

⁷⁴ 見王先謙，《荀子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80-81。

後王是也。此法其法也。」⁷⁵以為上古政法與「因時變通」尚可調和。另如黃以周，僅於 1870 年中舉，但曾受寧波知府宗源瀚及江蘇學政黃體芳之邀，課經學於寧波辨志精舍及江陰南菁書院，亦就《周禮》的致用問題有所論述。他說：「欲行《周官》之法，必盡放(仿)其制而後可，……然古法之難行也，為古制不能盡復也；古制既不能盡復，其法固有難恃。而有合於時宜可以放(仿)古通行者，亦必就此一法慎審其終始利弊，宜合本經各職前後參之。」總之，「既得其意，乃可用其法；既用其法，又宜體其意而彼此維持，果能如此，則參用其法乃不失《周官》立法之意。不然，舉一廢百，未有不賊道者矣。泥古而敗，豈獨《周官》，而《周官》不以此受誣也。」⁷⁶

後來孫詒讓在《周禮正義》自序中，也談及同類問題。與多數人一樣，他認《周禮》為真經，且以為此「非徒周一代之典」，自黃帝以來的「經世大法，咸粹於是」。他覺得疑經者「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瘡，至今未已者」，則是王莽、蘇綽、李林甫、王安石等輩「以巧辭衰說附托者為經累也」。他稱「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鼓瑟之見也」，而古今之別則在「其治之跡與禮俗之習已耳」。封建井田等等都是「跡」與「習」，今之勢必不能行，情必不能安，一些大禮大節則古今相通，「然則古人之跡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閱意眇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日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經。」使人知「為治之跡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顯而易見，這些從事經典考據的士人科舉仕進的情形、參預時政的程度不一，但均未否認「經世」意識與自身的天然關聯，且均認為經學理應關乎政事。只是在表態「通經致用」之餘，他們均回到了「法其意」的思路，而若仍只有「政教之閱意眇指」「貫百王而不敝」，對上古典制作空前精密的考訂，以求「致治之跡」的詳確則又是何必？對此，孫詒讓轉而強

⁷⁵ 俞樾，〈皇朝經世文續編敘〉，收入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1。

⁷⁶ 黃以周，《傲季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文四，〈答周官問〉，頁503。黃在此文中稱「吾友孫仲容書未得見」，應即指《周禮正義》稿。

調理想中的「考據」與「發揮」的遞進關係，另冀「世之君子」「別為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⁷⁷即他已認為治學方法的精密化本身，不足以鞏固經學與「經世」的關係；⁷⁸而其時西力東漸，由「學」及「政」的思路固然依舊普遍，倡言經世者的視野卻已不能局限在中土既有的知識資源範圍之內了。

三、西力東漸下的經典與「經世」

至孫詒讓這一輩人步入中年時，「經世」所指涉的政情世務較之前已有了顯著變化。乾隆末年的吏治敗壞，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咸、同年間規模更大、歷時更久的太平天國戰爭，以及差不多同時的捻軍、回民起義等父祖輩的時局主題，已均成為過去時。所謂「同治中興」亦已結束，西力東漸成為士人危機感的主要來源。當然，當初太平天國起義已被許多人視為以「洋教」為幟，可除卻少數在上海、廣州等地長期活動的官紳外，這一點也只是反過來加深了親歷者對於西方及西風東漸的惡感。孫衣言便曾說：「咸豐、同治以來，削平大盜，撫納遠人，一時材能之士因事會以就功名，遽欲任其私智以治天下，其意以為古人之法不可復施於今，顧反誅於奇邪怪誕之術，趨和風靡，舉世騷然，未知所屆。」⁷⁹又曾結合從「人心」出發、「內聖」方能「外王」的觀點，稱：「以文辭治經，固失其所以為經；以智術治事，則且以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法為不足以治天下，而功利浮淺之說中於人心，至其橫溢，則雖海外萬里荒誕之人皆能鼓起不經之邪說以

⁷⁷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自序〉，頁1-5。

⁷⁸ 另如陳澧認為《周禮》中必有「末世增入」，但確屬「周公致太平之跡」，士人讀《周禮》後當讀《大清會典》，以通貫古今。至於「謂《周禮》不可行者，徒以王安石之故耳」，而其舉出的正面例子，僅是宇文氏用《周禮》，（北周）國亡不「失節」，及明代夏原吉在蘇州以古法除「水怪」（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中亦借此證明「聖經之有用」）兩事。見陳澧，《東塾讀書記（外一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23-126、135-136。

⁷⁹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甌海軼聞甲集序〉，頁460。又見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冊（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甲集自序〉，頁1。

惑亂天下，而天下之變遂至於不可言。」⁸⁰1879年孫衣言退職還鄉，至1880年代中期，孫詒讓已繼承了父輩在鄉的影響力，成為地方上的頭面人物。他大多時候隨父在瑞安縣或溫州，有時還會依照長期待父在外養成的習慣，至上海採買舊籍新書，其間亦會涉及「經世」書籍與中譯西籍的搜羅。1884年中法宣戰，沿海戒嚴，作為地方望族子弟的詒讓籌辦團防，這份經歷也終於成為一個契機，使他的精神世界被注入了父輩所未重視的新內容。

這期間，他開始閱讀徐繼畲《瀛寰志略》、魏源《海國圖志》，以及外人新譯的《地理備考》、江南製造局刊本《海道圖說》、《長江圖說》等書，大體上都是一些可為籌防之參考的著作。⁸¹這一帶有一定功利性的閱讀，後遂波及與之相類的書籍，如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孫氏稱其「所論與余同者大致十得七八」，後又「續購新印本讀之，再就最近時事見聞所及，加綴案語數條」，以申前說。⁸²他還曾集中交待自己「嘗覽涉者，如安吳包氏(世臣)、邵陽魏氏(源)、善化孫氏(鼎臣)、吳縣馮氏(桂芬)諸家之書，其尤著者也。魏、馮之書，恢奇闊深，善言外交，多采摭西政之善，欲以更張今法。」⁸³相應地，他也開始閱讀主要在上海出版的各大報刊，包括《格致彙編》、《申報》、《萬國公報》、《新聞報》等，每有朱墨筆圈點、箋記。⁸⁴而孫詒讓中舉時出張之洞門下，張後來在廣東、湖北等地興辦洋務，對孫似也有一定影響。1887年張的侄女婿、孫衣言門生黃體芳之子黃紹箕抄錄薛福成倡言鐵路建設的一篇奏疏寄示詒讓，據稱數年後(1890)孫氏赴鄂與張之洞商榷《周

⁸⁰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黃岩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頁478。另孫衣言對洋務派以西人「船堅炮利」，欲「師夷長技」一節亦有不滿，認為應以中土固有之「長」攻夷之「短」，「功利浮淺之徒又欲效為輪船火器，循所短攻所長，非所謂天下之至愚者耶？」其具體論述，見孫衣言，《遜學齋文鈔》，〈張先生墓誌銘〉、〈書泉州志裴震忠傳後〉、〈書葉文定公薛德老墓銘後〉，頁328、445。

⁸¹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10、214-215。

⁸²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21、252。

⁸³ 孫詒讓，〈沈儷崑富強弱議敘〉，收入許嘉璐主編，雪克點校，《孫詒讓全集·箱廬述林》，頁351。

⁸⁴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28、233、262。按《格致彙編》與《萬國公報》在1880年代中期均處於停刊狀態，若《年譜》所云肇始時間不誤，則詒讓應是閱讀之前的「過刊」。

禮》疏長編稿的刊刻事宜，即趁機「力言築路為救國急務」。⁸⁵

此期對於時務的關注即成一種鋪墊，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馬關條約》的簽訂造成全國士氣高漲，有識者無論在朝在野，競相上書著文，倡言變法維新。孫氏友人(似即黃紹箕)告以強學會之倡議，以〈強學書局章程〉見示，孫詒讓便擬《興儒會略例》廿一條回寄，敘中言及：「竊謂今日事勢之危，世變之酷，為數千年所未有，中國神明之胄，幾不得齒於人類，似非甄微廣學搜書購器所能稽撐。鄙人秉資暗弱，於經世之學，夙未究心。然念家承詩禮，忝列士林，睹此危局，覩然人面，不願坐視夷滅。」⁸⁶之後維新運動漸次鋪開，而士人自辦報刊亦開始風行。最著名者即梁啟超、汪康年等主持的《時務報》，另如《知新報》、《國聞報》、《湘報》、《湘學新報》等屬於聲勢較大的「呼應」者，而如杭州《經世報》、上海《實學報》雖明標「經世實學」，卻「有與《時務報》為敵之意」。⁸⁷在這種眾聲雜遝的氛圍中，孫詒讓大致堅持「讀者」身份，在鄉依託主授天算之學的地方教育機構——瑞安學計館(1896年初開辦)，批量訂購《時務報》、《知新報》、《農學報》等時新報刊。只是在閱讀之餘，他還適度地推廣地方經驗，如瑞安學計館的章程學規及孫氏撰作的敘便曾統一以〈溫州瑞安學計館程規〉之名，登載在《知新報》上；⁸⁸鄉里士紳組織「務農支會」，推孫為首，其會敘、會友名單、請官立案稟(黃紹箕撰)均在《農學報》發表。⁸⁹當時各報多有士人捐助，報中則登載「助資諸君名氏」作為表彰，孫詒讓亦曾因「助銀一百元」，在《時務報》上列名。⁹⁰總之，借助時新書報的閱讀與流通作出回

⁸⁵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30、241。

⁸⁶ 孫詒讓，〈興儒會略例並敘〉，收入張憲文輯，《孫詒讓遺文輯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頁8。

⁸⁷ 張元濟致汪康年書，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1713。

⁸⁸ 見《知新報》，第26冊(光緒丁酉七月初一日，1897年7月29日)。另孫延釗〈孫籀公與清季溫處地方教育〉一文稱孫詒讓所撰〈瑞安新開學計館敘〉曾發表於《時務報》與黃慶澄所辦之《算學報》上，見徐和雍、周立人編，《孫延釗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頁360。但筆者遍檢《時務報》與現今存世的《算學報》(1897，共12冊)，未發現孫氏此文。

⁸⁹ 見《農學報》，第29冊(光緒戊戌閏三月中，1898年5月)、第30冊(光緒戊戌閏三月下，1898年5月)、第33冊(光緒戊戌四月下，1898年6月)。

⁹⁰ 《時務報》(光緒丙申八月初一，1896年9月7日)，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應，即是維新時期這些並未真正進入官場的士人與官場中人一同置身「經世」浪潮的一種常見的方式。

反過來講，「甄微廣學」雖不足以應對「世變之酷」，卻也正是孫氏認知西學西潮的一個始發點。因考據需要廣博的知識面，這種對於「博」的追求發展到一定程度，便可能(不是必然)產生包羅異域之學的訴求。如孫氏研治《墨子》，即曾與梁啟超通書，將〈經說〉上下篇的某些內容與歐氏幾何、奈端(牛頓)力學及熱學等大作比附。⁹¹進言之，晚清時所謂「西學中源」說，以及未曾明言源流關係的中西比附臻於極盛，所據者自然還有經部典籍。如《周禮·地官·司徒》中稱「草人掌土化之法」，即常被時人拿來比附西方農學、植物學乃至化學。⁹²〈地官·司徒〉列「保氏」為教國子之官，所授「六藝」中即有算數，此被孫詒讓等引作在地方開設學計館的典籍依據。⁹³後補入《周禮》作為「冬官」的〈考工記〉，也常被用於比附西方格致算學；而即便認〈考工記〉非《周禮》原書者，亦曾據此分辯接引西學乃是「禮失求諸野」，如鄭觀應所云：「自《大學》亡〈格致〉一篇，《周禮》闕〈冬官〉一冊，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徙而入於泰西，其工藝之精，遂遠非中國所及。」⁹⁴

西學的引入，先偏向工藝技術方面，而其之所以「有用」，通常也便是因其「可致富強」。馮桂芬即已聲言：「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⁹⁵「富強」一語因其法家意味，在當時或引起部分人的反感，但工藝知識須上升到「治術」層面，方有借鑒價值，在

第33輯第4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頁267。

⁹¹ 許嘉璐主編，雪克點校，《孫詒讓全集·籀廬述林》，頁382-383。

⁹² 參見全漢昇，〈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第4卷第2期(廣州，1935)，頁57-102。

⁹³ 〈溫州瑞安學計館程規〉，《知新報》，第26冊(光緒丁酉七月初一日，1897年7月29日)。

⁹⁴ 鄭觀應，《盛世危言》，〈道器〉，收入《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242。

⁹⁵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采西學議〉，頁151-152。

此亦十分明確。通常認為這一觀點後被沈壽康歸結為「中體西用」論，經張之洞等廣泛傳播。⁹⁶此時將「西藝」上升到「政」的高度的做法已擴展到對西政西法的直接紹介接引，如張之洞即明分「西藝」與「西政」，而作為救急之方，無論中西，「政」都比「藝」來得關鍵：「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⁹⁷不過「中政」並未遭到遺棄，如《周禮》之「大義」即「治國、治官、治民」，⁹⁸故依託此經直接在「政」層面上的中西比附，如「上下通」與設議院、上古設官之法與改官制、鄉遂制度與基層管理、《周禮》市政與警察制度、《周禮》學校與開辦學堂等等，在當時亦甚為常見。

而在將外來內容納入既有的分類體系時，是統歸為「學」，還是以「農政」「兵政」等類目分別標示，時人依然不免遇到困難。如著名的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中便坦承：「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今取便學者，強為區別，其有一書可歸兩類者，則因其所重。」⁹⁹現有學者通過對清季多種《經世文編》的分析，指出當時對西學歸類的混亂，部分即是因為「西學內容大量湧入之後，傳統的『學』與『政』的觀念尚無法理解和消化西學內容」。¹⁰⁰不過，孫詒讓對此一政學關係仍持肯定態度，他擔

⁹⁶ 按在張之洞之前如郭嵩燾等、之後如嚴復等已指出中西各有體用，而張氏此處之「用」與「經世致用」、「通經致用」中的用法雖有重合，但不完全相同。故「政」究竟屬於「體」還是「用」，《勸學篇》中亦未明確，兩種歸類實際均有，而張的本意與時人的普遍理解，謂之「中主西輔」或「中本西末」可能更為準確。有論者指出，「中體西用」之說等於提示中學「無用」（參見謝放，〈中體西用——轉型社會的文化模式〉，《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武漢，1996），頁5），或許多少混淆了上述兩種「用」的意涵——儘管這種混淆可能確在歷史場景中發生。鑒於這種複雜性，筆者視「中體西用」本身為另一論題，其學理上的問題在此不擬深入探討。

⁹⁷ 張之洞，《勸學篇》，〈序〉、〈外篇設學第三〉，收入苑書義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9705、9740。

⁹⁸ 張之洞，《勸學篇》，〈內篇守約第八〉，收入苑書義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頁9727。

⁹⁹ 《飲冰室合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文集之一〉，頁123。

¹⁰⁰ 參見章可，〈論晚清經世文編中「學術」的邊緣化〉，《史林》，第3期（上海，2009），頁68-74。

心的正是「中國政學舛馳，其不相謀久矣」。他以當時往往列為西學入門的「天算之學」為例，認為「嘉道間通人，如董方立(祐誠)、戴鄂士(煦)以逮近世鄒特夫(伯奇)、李壬叔(善蘭)，皆究極闡微，抗席西士，然亦不過創立新率，著書名家而已，其於致用，尚邈乎遠也。」¹⁰¹士人習慣性地將中西學術一併納入有關「經世」的傳統思維框架，西學歸類難以達到後人習見的那種「清晰度」，便也無足深怪了。

總之，與其他某些地區的響應者一樣，孫詒讓在此維新時期始有了較多趨時經世的表現。而因對科舉仕進感受不佳，其付諸行動的方式，乃是盡可能利用頭面士紳的身份，促成地方文教改良。¹⁰²百日維新期間，朝廷將其列入「經濟特科」，他未及進京，變法即告失敗。¹⁰³之後孫氏便一心經營鄉里，直至經歷庚子國變，清廷頒詔決意施行「新政」。

1901年，以研治金石目錄之學著稱的翰林院編修費念慈，向同為江蘇武進人的會辦商務大臣盛宣懷進言，「欲撰一書進呈，以《周官》為之綱，以歷代政治之因革損益諸大端為之目，包舉西政，尋其源之出於中法、不謬戾於經義、可實見施行者，條舉而件繫之，以大破近日言變法之狂謬，別黑白而明是非，正綱常而開風氣，宗亭林『撥亂反正，法古用夏』之言，以鄭、賈之學治天下，彰中國文明之教，一洗詖邪迂陋之痼習。」盛宣懷「極為然」，決定在太后光緒帝一行回京後即行上奏，托費撰定此書，費又將此事經由瑞安籍進士、江蘇金壇知縣胡調元轉托孫詒讓完成，許以書成後由盛出資刊刻《周禮正義》。費在致胡的信中稱：「我輩沉霾章句，棲遲山林，本無用世之志。然人心將滅，名教漸弛，此則儒者之責。」而孫以「治經」聞名，又曾列入經濟特科，這在他看來應就是一個「學」以「經世」的典型，依託《周禮》「發揮旁通」的任務，也便落回到了治經者自己頭上。只是與治經方法的精密化相應，這番由「學」及「政」的闡發理應

¹⁰¹ 孫詒讓，〈興儒會略例並敘〉，收入張憲文輯，《孫詒讓遺文輯存》，頁8。

¹⁰² 參見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70-276、279-287。

¹⁰³ 孫詒讓後來亦在《變法條議》(之後更名《周禮政要》)書尾的自題詩八首中注稱：「戊戌變政，持議者多舉制科，未試而黨獄興矣。不佞以陳右銘(寶箴)中丞、瞿子久(鴻禔)學使薦，亦廁名其列。陳尚未識面，蓋得之黨人某也。」見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97。

做到「條舉而件繫」，力求細化。在之後一封催促的信中，他又重申了自己的期望：「《周官》一書得仲頌先生定稿，可以古學挽狂瀾矣！」另外，鑒於孫氏曾作《墨子閒詁》，遂又形成兩份計畫，一統以經，以證「西政」中源，一統以子學，以證與「政」難以直接建立聯繫的「聲光力化」等「西學」之中源，「關近時外中國而內夷狄者之口」。¹⁰⁴

因「索稿甚急」，孫詒讓「乃杜門旬日，成此四十篇」，命名《變法條議》，其間似亦參考了宋恕的修改意見，然「愧不能精備也」，¹⁰⁵且對第二份撰作計畫沒有回應。費、盛讀後，又托時已在野數年的文廷式補寫一部分，統一整理後題以《周官政要》，¹⁰⁶可此書最終亦未上呈。1902年，孫氏遂自行將《變法條議》副稿易題《周禮政要》，分成二卷並補作自序，俾瑞安普通學堂刊行，作為教學用書。¹⁰⁷

與其父不同，在《周禮政要》一書中，孫詒讓不甚強調「修己治人」的重要性，多半直接切入討論種種「治術」層面的問題。其體例則與《周禮正義》明顯有別，以「朝儀」至「會計」二十專題為上篇，「戶版」至「收教」二十專題為下篇，專題內才首列經文及鄭注，再以案語形式引出史論，而西洋及受西洋影響的日本政法又與「史」列在一處，共同凸顯中土今法之非，故是否算得「以《周官》為之綱」，尚可商榷。¹⁰⁸也即孫氏是按制度變革的各方面來選取經文，而非相反，在各專題中，「經」、「史」、「西」才三者並舉，「經」與後二者在體例上尚有遞進關係。然而言及具體變革措施，則多以西法為參照，只是經過治經家的取捨，合乎周代設官施政之「遺意」。對此，作為讀者之一的標舉今文經學的皮錫瑞自有看法，他以為《周禮》雖可稱「經」，卻已時移世易不再實用；其中封建與郡縣是一大區別，而歐洲日本本是「封建」制度，反更合乎中土古經之遺意。也即皮氏在此仍取

¹⁰⁴ 費念慈，〈致胡調元書〉，收入胡珠生，〈孫詒讓佚文輯錄〉，《紀念孫詒讓論文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212-213。

¹⁰⁵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96-297；宋恕，〈致孫仲容書，附周禮政要讀後〉，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607-610。

¹⁰⁶ 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42-149。

¹⁰⁷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303。

¹⁰⁸ 另文廷式的補寫部分也未另起爐灶，篇內次序與詒讓一致。

一種「禮失求諸野」的思路，可禮雖能復得，卻依然不可復行，這在他看來即《周禮政要》一書所謂中西政法「暗合」之意。¹⁰⁹

實際上，孫詒讓的所謂「暗合」，本就是對「禮失求諸野」的思路提出質疑。1899年《周禮正義》自序中業已明言：「今泰西之強國，其為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為政教者，……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¹¹⁰也即西國致治之術與中國上古三代本談不上源流關係。之後孫詒讓以《變法條議》一書乃是「陳古剴今以杜守舊者之口，與詁經屬文義例不能強同」，「雅不欲尸其名，故義不系敘跋，偶存此副移聊示家塾子弟。」¹¹¹書後自題詩亦云：「中外文明倘同軌，豈徒閎侈說齊鄒？」¹¹²次年更名《周禮政要》，其補作的自敘也僅稱：「《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政要》之作，「非欲標榜古經，以自張其虛僞而飾其竊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爾。」¹¹³即此書本是面向觀念「偏舊」的讀者論證變革之正當性，與費念慈的初衷可謂迥異其趣。

具體到各篇內容，如「朝儀」篇謂西禮與中國古禮不同，「然其簡而易行則一也。」且「禮莫大於因時制義」，中土拜跪之禮於古無徵、泰西無有，故當就此革除。「通藝」篇謂古之六藝在今已多「非學者所急」，惟有九數「今宜專治」，而「泰西一切政教理法，無不以數學為根柢」，西算令中土古算「芻狗已陳」，故應推廣西算及以之為基底的各科西學。「攷工」篇謂當前中土工藝不如泰西，即在「彼求新而我守故，彼專精而我習樞耳」，強調的仍是「求變」而非「仿古」。總之，除篇首詳列經注以外，其與闡發變革

¹⁰⁹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57-60。

¹¹⁰ 孫詒讓，《周禮正義》，〈自序〉，頁4。

¹¹¹ 楊青，〈孫詒讓《自題周禮政要》八選〉，《慈蔭山房筆記》，初筆卷4，收入謝作拳、伍顯軍編，《楊青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頁224。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將自題詩之作列於1901年，此應是《變法條議》副本，更名《周禮政要》並補作自序當在其後，故此處有「雅不欲尸其名，故義不系敘跋」一句（《年譜》中卻無此句，不知何故，見頁297）。

¹¹²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97。

¹¹³ 孫詒讓，《周禮政要》（溫州圖書館藏，1902），〈自敘〉。亦見許嘉璐主編，雪克點校，《孫詒讓全集·籀廬述林》，頁166-167。

主張的一般經世著作並無太大區別(如「觀新」、「漁征」、「同貨」、「諭刑」等篇所列經注僅隻言片語，與一般倡言經世者援經據典的方式更無差異)。而《墨子》作為長期被邊緣化的一部子書，在孫詒讓看來似難如經典那般賦予論證對象以天然的正當性，因此也沒有在「經世」語境中另行發揮的必要。

胡玉縉後來評論說，孫氏的趨新態度與變革主張本身值得肯定，但此書與宋人夏休所撰《周禮井田譜》類似，「書名《周禮政要》，而與《周禮》本義不甚相關。」¹¹⁴而經典考據抉發的「古」的精確性，雖然仍未融入「經世」語境，這一問題本身在治經家看來已不重要——古經在此乃是作為凸顯引據西學西政之正當性的一個「媒介」。只是孫已承認外來學術與政法知識自有其源流，當「禮失求諸野」的思路受到質疑，經的這一不言自明的正當性源泉的地位，也只能是暫時和過渡性的了。

四、結論

本文分析的個案是 19 世紀中葉以來孫詒讓研治《周禮》、著書立說的經歷，而因其似未提出何等卓異的具體主張，在今日多以變革建議或「政策」分析等同經世思想的研究中，孫氏及其所「立」之「言」並未受到多少重視。不過，倘若換個角度，相對一直活躍在通都大邑的某些「經世思想家」，或許這一總體上更顯「普通」的個案，倒更能藉以「知人論世」，促使今人對既有的書寫範式所展現的晚清思想史或學術史圖景，作出某些進一步的反思。¹¹⁵

前人早已論及中國歷史上「經世」思想的根源，便是傳統士人介乎「學者—官員」之間的身份屬性。但這一點在思想史書寫中通常是作為遙遠的「背景」呈現，對其之於相關文本的形成與(歷史上的)解讀過程，乃至士人學

¹¹⁴ 胡玉縉，〈周禮政要跋〉，收入胡玉縉著，王欣夫輯，《許廩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13，頁314。

¹¹⁵ 如宋恕即曾以為相對章炳麟等，詒讓與同為治經家的黃以周「經世之理茫然無異常流」，見宋恕，〈又覆胡、童書〉，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8。這固然只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了部份時人對孫、黃等治經之士的看法，即他們不是根本上不求「經世」，而只是在此方面「無異常流」。

術生涯本身的種種直接的作用，卻仍缺乏必要的敏感。就經世思想而言，「官員」或「准官員」的身份認同(而非「學者」)似更顯重要。清代士人固可以空前精密的手段治經，但仍會受到兩方面社會因素的限制與規訓：一是它的非常規性，經典考據的門檻實際更高，受提攜贊助的機會有限；二是考據之「士」無論對科舉仕進體驗如何，其在「君」「民」之間的自我定位與其他讀書人亦如出一轍，而其賴以取得「治學成就」、並以此成就實現進一步擴張的社會資本，亦可順遂地轉入經世語境，使之獲得在其間的「立言」之權。因此無論漢宋，皆有關於「經世」的表述，某些倡言經世者對學風士風的指責，首先也只是「表述」，通過在「政」的層面鋪陳「學」的現實性，得以標示更顯「天然正確」的立場。晚清主筆杭州《經世報》的宋恕(其自稱「攝著論」)即曾明言：「始汗經世者，別經世為學之一宗者也。」訓詁為孔門四科之始，辭章為終，而四科「何一非經世之學」。¹¹⁶這番表述同樣理想化，卻可進一步提示我們，一方面在今日看來，歷史中人具體的經世主張或行動不一定與其「學」明確相關，而在另一面，歷史上這種相關性的「建構」卻頗為常見。承認這種「表述」的歷史性並考察其與「實踐」的歷史關聯，而非單純抹殺此類「表述」或走另一極端(將「表述」徑直等同於「實踐」)，我們方可有望突破將思想學術視為懸浮於社會上方而不斷呈現「升降盛衰」之態勢的「有機體」、並將經世意識與之捆綁的「學派史」視野，從而對於治學之人與其所處之時代的關係，實現某種更直觀也更顯立體的理解。

總之，晚清從事經典考據者與那些以「經世思想家」知名者有著近似的階層認同，漢宋、今古之別固可以聚訟紛紜，卻似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考據之士對「經世」天然有著更深的隔膜。¹¹⁷晚清國勢日蹙，基於官場士林的人际與書刊閱讀，士人參與著書撰文，乃至介入近代報刊的運作，經世遂

¹¹⁶ 宋恕，〈經世報敘〉，《經世報》，第1冊(1897年8月)，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273-275。

¹¹⁷ 同樣地，因在以往的思想史家看來如鄭觀應、薛福成、王韜、陳熾、陳虬等對經典的引述闡發未可稱「學」，故只能在「經世思想家」的榜單中出現，而不會在「經學史」或「學術史」脈絡中現身。

由「思想」而成「思潮」，而各位「預流」者亦不必有明晰的學術派分。¹¹⁸但所「立」之「言」，尚須作正當性的論證，只是這一論證通常已隱含在援據內容之中。對於倡言經世的多數官紳而言，「經」作為不言自明的正當性之源泉，在經世語境中的地位同樣無可取代。¹¹⁹問題在於，部分學人治經方法的空前精密化，亦須上升到「政」的層面——藉以使作為後世範本的上古政法進一步「精確化」。可治經之士在「守經」與「達變」之間權衡，鑒於某些負面的被視作援經改制的歷史記憶，便又往往回到「法其意」的思路。精密化的經學以一種去精密化的形式進入「經世」語境，作為上古「致治之跡」的載體，經典不言自明的正當性之下則是仍舊曖昧難明、卻又仍舊無法徹底回避探討的「實用性」。

這一問題日後能否在中土既有的知識資源範圍內另覓途徑解決，今已不得而知；因晚清西力東漸的深度與廣度日漸提升，外來的工藝政法知識之「有用」，轉而成為倡言經世者的普遍認識。在「禮失求諸野」的名義下，古經及其他傳統典籍資源被廣泛地藉以比附西學西政，彼此間乃至建立了某種「源流」關係。然而何種中土資源更受時人重視，已反過來受制於時人對何種外來知識更顯「有用」的判斷。在此，上古「致治之跡」的精確

¹¹⁸ 有論者將孫詒讓受邀著《周禮政要》，視為在朝官員要與康梁維新派唱對臺戲，參見孫青，〈「以《周官》為之綱」：清末新政前後朝野對傳統資源的應用一例〉，收入黃東蘭主編，《新史學第四卷·再生產的近代知識》（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52-62。孫詒讓自己也曾說：「康氏學術之謬，數年前弟即深斥之，去年（指1897年——引者注）致章枚叔（炳麟）孝廉書，亦曾及之。然其七八上書，則深欽佩其洞中中土之癥結。」（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1474。）但由學及政之「學」不一定明確學派之分，如當時明斥康「學術不正」的人不在少數，據筆者所見，多數亦難明確其傳統學術「派別」。另外，孫青該文業已指出，康門師徒在以中法比附西法時，也多次用到了《周禮》，可見其在進入「經世」語境時，亦未嚴守今文經學之「門規師法」。

¹¹⁹ 關於近代經史的地位變遷，參見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收入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302-341。文中多以後人及後代史家對之前思想學術的評論文字為據，亦提及經世思潮在其間的作用，然較簡略。另參見章清，〈傳統：由「知識資源」到「學術資源」——簡析20世紀中國文化傳統的失落及其成因〉，《中國社會科學》，第4期（北京，2000），頁190-203；章清，〈中西歷史之「會通」與中國史學的轉向〉，《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2005），頁75-95。

化能否用以強化經典與「經世」的關係，這一問題本身已不復重要。¹²⁰於是，當「史」在外力影響下演變為「歷史」，成為近代民族國家建構不可或缺之內容，「經」則由於西學西政日益展現出獨立的正當性，復從正當性源泉的一面退卻，其對於整個知識與觀念體系的關鍵意義，相應地也開始被淡化。

從這一點上反觀費念慈的「以《周官》為之綱」，可見其意不在倡言經世本身，而是要反過來維護經典古學在經世思潮中危機四伏的地位。只是總的來看，相關制度性的表達與實踐向有顯著差距：理想狀態中，士人學經以求科名仕進，從而獲得機會以學「經世」；但實際上，經在清代科舉中的存在狀態仍流於高度的簡化與程式化，從事較有自主性的以經為主要對象的考據，卻非常規的士人自我實現之路。而考據家在官場士林中高揚的「經世」意識，亦消泯了其治學方法上的「少數派」特徵，進而一同促成了這一知識資源的媒介化與工具化；當西學西政自身的源流已獲承認，這一工具化了的「正當性源泉」本身也將無足輕重。「新政」階段，取才制度的改革又首當其衝，經義被挪到了末一場，「史論」轉而更受關注。¹²¹而《周禮政要》尚在外地付印且頗為暢銷，也是因其將經義考試內容整合進新的重點——時務策與史論的框架之中，尚是新舊過渡期的一部理想的「應試用書」。¹²²1905年科舉停廢，這一空殼化了的常規制度保障本身也不復存在，青年士子、少年學子大量轉為學堂生，與一貫的程式化印象相應的功

¹²⁰ 另標舉今文經的廖平、康有為等人則力圖將「真經」徹底「寓言化」，本質上講，同樣將經典僅僅用以證明「因時改制」的正當性。當然，這一問題同樣複雜，當俟另文探討。

¹²¹ 嚴格來講，「策」與「論」當屬兩種題型，關於策問中「史」之地位的體現，參見章清，〈「策問」中的「歷史」——晚清中國「歷史記憶」延續的一個側面〉，《復旦學報》，第5期（上海，2005），頁53-62。

¹²² 參見孫青，〈「以《周官》為之綱」：清末新政前後朝野對傳統資源的應用一例〉，收入黃東蘭主編，《新史學第四卷·再生產的近代知識》，頁67-73。文中提到，1903年上海日新書局評點本《周禮政要》明言《政要》適合「半新半舊」的士子應試。另外，創辦於1902年初的瑞安縣普通學堂亦規定，「每逢星期六，試作策論一篇，仍如家塾書院改卷舊制，評定名次，揭榜出示。」見孫廷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99-300。《周禮政要》為該堂教學用書，或也有助於堂中學生練習策論應考。

利主義態度也便由此日益彰顯。

廣興學堂階段，主持學務的官紳多番提倡尊經讀經，¹²³可學堂生對這一傳統文化養成之核心的興趣與研習水準，已越發引起辦學者的批評與不滿。¹²⁴而孫詒讓因對科考的惡感，據稱在得知科舉停廢時還「大喜，為賦紀事詩八章」，¹²⁵可之後成為溫、處兩州學務分處總理的他對於經典在新制中究竟如何安置、在現世還有何「用」，卻已感到茫然。1907年在致日本學者館森鴻的信中他提及：「不佞曩者所業，固愧芻狗已陳，屠龍無用，故平日在鄉里未嘗與少年學子論經、子古義，即兒輩入學校，亦惟督課以科學。」他期待有朝一日各國「勢力平均」，尚能「投戈講藝」，「王(念孫、引之)、段(玉裁)諸家之書，……將復為世所珍重，而今之人虛僞新奇之論，亦必至煙銷灰滅，不值一大噓。」卻又「深愧所學與現時不相應」，只是「私心所自信者，平心以求古今之是而已。」¹²⁶

這番糾結的說辭，似不僅是出於自謙。當年冬，他在意圖上呈的《學務本議》中，便又就官方「讀經」的倡議作了一番正面的發揮。他以為在「定國是」、銳意求革之外還應「保國粹」，稱：「吾國四部群籍，浩如煙海，以言國粹，莫重於經。」而當時一些教員照著「徒欲強之誦讀」的路數，「使少年學子，薄經訓為迂談，齟齬幼童，坐講筵而欲睡。」如今因西力東漸，教學方式上的常見缺陷將直接誘使學子棄舊務新，這一點他基於自身文化養成與學術取向，顯然還是難以接受。他認為，泰西之古學可與新學新制並存乃至相通，那麼中土「國粹」也理應能夠做到。¹²⁷如可以西學各科對

¹²³ 具體到「三禮」，如《奏定學堂章程》即規定，《禮記》為初等小學必讀，《儀禮》一篇為高等小學必讀，《周禮》則為中學及初級師範學堂必讀(另一必讀經典為《春秋左傳》)，因「學生年歲已長」，讀兩經「以備將來學成經世之用」。見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頁294、309、319、402。

¹²⁴ 參見關曉紅，〈終結科舉制的設計與遺留問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廣州，2011)，頁9-21。

¹²⁵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325。

¹²⁶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351。

¹²⁷ 按這一思路可能是受《國粹學報》言論的影響(如其中以「恢復國粹」比擬歐洲文藝復興的論調)，因據《年譜》反映(頁321)，孫詒讓曾訂閱該報，而該報首期、1908年首期(總第38期)、1908年第4期(總第41期)亦刊有孫氏的文章與書信(再後一些相關

應各種經典的記錄：「電學則可援《禮記》之神氣風靈；農學則可引《周禮》之草人土化；〈王制〉州服，涉開方冪積之算，〈考工〉柯樞，通割圓弧角之形，則算術形學也；以逮博物動植，資多識於《毛詩》，校異名於《爾雅》，應時舉證，尤採獲不窮」，總之，「但能得精通中學之教員，引申比傳，其益無方，斯又不限於讀經一課矣。」¹²⁸需要指出，這並非回歸「西學中源」的老生常談，而是一種力求會通「經學」與「科學」的「教學設計」。只是如此一來，又不免透露其對中西權勢轉移的某種「默認」，即在下一代讀書人的育成過程中，必須援據西學，「國粹」方可「保」，中土經典之價值方可顯現。換言之，不言自明的正當性源泉已反須原初待其認證的外來潮流認證其正當性，這種數年間即深入到育才實踐環節的「主客顛倒」，足證世風丕變，已到了何等劇烈的程度。

1912年民國代清，皇朝體制正式宣告終結。「經世致用」一詞繼續被人使用，只是這裡的「致用」之學，已漸指向各門科學，對應更顯細密的社會分工與職業分化；而史學亦因與近代國族建構的密切關聯，在新的學科體系中得以繼續發展。學堂讀經則基本停止，「為學術而學術」的觀念同時並起，卻使經在高等教育的學科建置中，作為一類「已死」的研究對象被文史哲等科瓜分。經的被邊緣化部分源於晚清在相對恒定的「學以經世」的士人思維模式下日趨劇烈的變革，在傳統士人階層停止自我更新後，卻又得到民國教育制度的進一步確認。¹²⁹知識與思想資源的代謝由是擴散到「人」的代謝，其時雖仍存在「經學」的提法，但健在的中老年士人及其中部分人的「讀經」倡議，已被不少青年後進視作社會文化革新「除之務盡」的目標之一。¹³⁰孫詒讓本人早於1908年逝世，面對這一曾經參與推動、卻

內容則是孫去世後刊登的)。但進一步的證據筆者未見。

¹²⁸ 孫詒讓，〈學務本議〉，收入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470-473。

¹²⁹ 這又涉及民國教育制度制定者的觀念，嚴格來講當是另一問題。他們或對傳統士人的思維模式有所繼承，或本是以接受西式教育為主的讀書人。本文只是提示這種衰落的緣由及表現在晚清與民國尚有不同，有時應分開討論，這兩階段或有一定承繼關係，但在後一階段亦可能有另外的因素加入，而前一階段的因素在此有所淡化，具體情形當俟另文探討。

¹³⁰ 與本文最相關的例子，即1920年代同為浙江瑞安人的周予同作〈僵屍的出祟——異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1926)，收入《古史辨》，第2冊，中編；而周予同先生為「經

終於坐實自己「所學」無關「所用」的近代知識與觀念變遷，他將有何進一步的觀感體驗，而今便也無從得知了。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史料

《朱子全書》，第17冊，《朱子語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Zhu zi quan shu, di 17 ce, zhu zi yu lei,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Hefei: Anhui jiao yu chu ban she, 2002.

《知新報》(澳門)，1897。

Zhi xin bao, (Macao), 1897.

《時務報》，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Shi wu bao, shou ru *Jin dai zhong guo shi liao cong kan san bian*, di 33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87.

《國粹學報》(上海)，1905-1908。

Guo cui xue bao, (Shanghai), 1905-1908.

《章太炎全集》，第4冊，《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Zhang Taiyan quan ji, di 4 ce, *Taiyan wen lu chu bian*,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1985.

《曾文正公全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Zeng wen zheng gong quan ji, shou ru *Jin dai zhong guo shi liao cong kan xu ji*, di 1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74.

《飲冰室合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Yin bing shi he ji, di 1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9.

《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第1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Wenzhou li shi wen xian ji kan, di 1 ji, Nanjing: Nanjing da xue chu ban she, 2010.

《農學報》(上海)，1898。

Nong xue bao, (Shanghai), 1898.

《算學報》(溫州、上海)，1897。

Suan xue bao (Wenzhou, Shanghai), 1897.

《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Zheng Guanying *ji*,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1982.
《顧頤剛全集》，第2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
- Gu Jiegang *quan ji*, di 25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0.
《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Gong Zizhen *quan ji*,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1975.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Shanghai tu shu guan, bian. Wang kang nian shi you shu zha,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86.
方東樹，《漢學商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Fang, Dongshu. *Han xue shang dui*, Shanghai: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37.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 Wang, Xianqian. *Xun zi ji ji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8.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 Wang, Anshi. *Lin chuan xian sheng wen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59.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
- Pi, Xirui. *Jing xue tong lu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54.
江藩，《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
- Jiang, Fan. *Han xue shi cheng ji; Song xue yuan yuan ji*, Shanghai: Shanghai shu dian chu ban she, 1983.
汪叔子編，《文廷式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Wang, Shuzi, bian. *Wen Tingshi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3.
周予同，〈僵屍的出祟——異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收入《古史辨》，第2冊。
- Zhou, Yutong. “Jiang shi de chu sui: Yi zai suo wei xue xiao du jing wen ti,” shou ru *Gu shi bian*, di 2 ce.
周夢江點校，《陳傳良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
- Zhou, Mengjiang, dian xiao. *Chen Fuliang wen ji*, Hangzhou: Zhejiang da xue chu ban she, 1999.
胡玉縉著，王欣夫輯，《許廩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58。
- Hu, Yujin, zhu, Wang Xinfu, ji. *Xu qing shu li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58.
胡珠生，〈孫詒讓佚文輯錄〉，收入《紀念孫詒讓論文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0。
- Hu, Zhusheng. “Sun Yirang yi wen ji lu,” shou ru *Ji nian sun yi rang lun wen ji*, Hong Kong: Tian ma tu shu you xian gong si, 2000.
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Hu, Zhusheng, bian. *Song Shu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3.

- 胡珠生編，《孫鏘鳴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
- Hu, Zhusheng, bian. *Sun Qiangming ji*, Shanghai: Shanghai she ke yuan chu ban she, 2003.
- 苑書義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Yuan, Shuyi, bian. *Zhang Zhidong quan ji*, di 12 ce, Shijiazhuang: Hebe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8.
-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遜學齋文鈔續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Sun, Yiyang. *Xun xue zhai wen chao; Xun xue zhai wen chao xu chao*,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544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 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
- Sun, Yiyang, zhuan, Zhang Ruyuan, jiao jian. *Ou hai yi wen*, Shanghai: Shanghai she ke yuan chu ban she, 2005.
- 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
- Sun, Yan hao, zhuan, Xu Heyong, Zhou Liren, zheng li. *Sun Yiyang Sun Yirang fu zi nian pu*, Shanghai: Shanghai she ke yuan chu ban she, 2003.
-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 Sun, Yirang. *Zhou li zheng y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7.
- 孫詒讓，《周禮政要》，溫州圖書館藏，1902。
- Sun, Yirang. *Zhou li zheng yao*, Wenzhou tu shu guan cang, 1902.
- 孫鼎臣，《畚塘芻論》，咸豐九年(1859)刻本。
- Sun, Dingchen. *Ben tang chu lun*, xian feng jiu nian (1859) ke ben.
- 徐和雍、周立人編，《孫延釗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
- Xu, Heyong, Zhou Liren, bian. *Sun Yanzhao ji*, Shanghai: Shanghai she ke yuan chu ban she, 2006.
- 徐珂，《清稗類鈔》，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
- Xu, Ke. *Qing bai lei chao*, di 8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4.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
- Ban, Gu, zhuan, Yan Shigu, zhu. *Han shu*, di 4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2.
- 張憲文輯，《孫詒讓遺文輯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 Zhang, Xianwen, ji. *Sun Yirang yi wen ji cun*, Hangzhou: Zhejia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0.
-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Zhang, Xuecheng, zhu, Ye Ying, jiao zhu. *Wen shi tong yi jiao z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5.
- 許嘉璐主編，雪克點校，《孫詒讓全集·籀頤述林》，北京：中華書局，2010。
- Xu, Jialu, zhu bian, Xue Ke, dian jiao. *Sun Yirang quan ji: Zhou qing shu li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0.
- 郭嵩燾，《禮記質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Guo, Songtao. *Li ji zhi yi*,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06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 陳澧，《東塾讀書記(外一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
- Chen, Li. *Dong shu du shu ji (wai yi zhong)*, Beijing: San lian shu dian, 1998.
- 惠棟，《松崖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Hui, Dong. *Song yai wen chao*,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427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 賀長齡、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 He, Zhangling, Wei Yuan, bian. *Huang chao jing shi wen bian*, shou ru *Jin dai zhong guo shi liao cong kan*, di 74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72.
-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 Feng, Guifen. *Xiao bin lu kang yi*, shou ru *Jin dai zhong guo shi liao cong kan*, di 62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71.
- 黃以周，《儆季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Huang, Yizhou. *Jing ji wen ch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 Huang, Zongxi, Quan Zuwang. *Song yuan xue an*, di 3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2.
- 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 Ge, Shijun, bian. *Huang chao jing shi wen xu bian*, shou ru *Jin dai zhong guo shi liao cong kan*, di 75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72.
- 劉公純等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
- Liu, Gongchun, deng dian jiao. *Ye shi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1.

劉成禺，《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

Liu, Chengyu. *Shi zai tang za y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0.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Qu, Xingui, Tang Liangyan, bian. *Zhong guo jin dai jiao yu shi zi liao hui bian: Xue zhi yan bian*, Shanghai: Shanghai jiao yu chu ban she, 1991.

謝作拳、伍顯軍編，《楊青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

Xie, Zuoquan, Wu Xianjun, bian. *Yang Qing ji*, Shanghai: Shanghai she ke yuan chu ban she, 2005.

顧炎武，《亭林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Gu, Yanwu. *Ting lin wen ji*,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402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Gu, Yanwu, zhu, Chen Yuan, jiao zhu. *Ri zhi lu jiao zhu*, Hefei: Anhui da xue chu ban she, 2007.

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大國學門週刊》，第2卷第13期(北京，1926)。

Gu, Jiegang. "Yi jiu er liu nian shi kan ci," *Bei da guo xue men zhou kan*, di 2 juan di 13 qi (Beijing, 1926).

(二) 專著論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bian. *Jin shi zhong guo jing shi si xiang yan tao hui lun wen ji*,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84.

王更生，《籀頤學記——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第1冊，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

Wang, Gengsheng. *Zhou qing xue ji: Sun Yirang xian sheng zhi sheng ping ji qi xue shu*, di 1 ce, Taipei: Hua mu lan chu ban she, 2010.

王惠榮，〈從晚清漢學區域之發展看漢宋調和〉，《安徽史學》，第2期(合肥，2009)，頁25-30。

Wang, Huirong. "Cong wan qing han xue qu yu zhi fa zhan kan han song diao he," *Anhui shi xue*, di 2 qi (Hefei, 2009), 25-30.

-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 Wang, Ermin. *Zhong guo jin dai si xiang shi lun xu ji*,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5.
-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
- Wang, Dezhaoh. *Qing dai ke ju zhi du yan ji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4.
- 全漢昇，〈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第4卷第2期(廣州，1935)，頁57-102。
- Quan, Hansheng. "Qing mo de 'xi xue yuan chu zhong guo' shuo," *Ling nan xue bao*, di 4 juan di 2 qi (Guangzhou, 1935), 57-102.
-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 Aierman (Benjamin A. Elman) zhu, Zhao Gang, yi. *Cong li xue dao pu xue: Zhong hua di guo wan qi si xiang yu she hui bian hua mian mian guan*, Nanjing: Jiangsu ren min chu ban she, 1995.
-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Yu, Yingshi. *Zhong guo si xiang chuan tong de xian dai quan shi*, Nanjing: Jiangsu ren min chu ban she, 2006.
- 吳佩娟，〈孫衣言及其《永嘉叢書》研究〉，《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1期(臺北，2008)，頁165-180。
- Wu, Peijuan. "Sun Yiyang ji qi yong jia cong shu yan jiu," *Dong wu zhong wen xian shang xue shu lun wen*, di 1 qi (Taipei, 2008), 165-180.
- 李海英，《樸學大師——孫詒讓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Li, Haiying. *Pu xue da shi: Sun Yirang zhuan*, Hangzhou: Zhejia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7.
- 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 Li, Xizhu. *Wan qing bao shou si xiang de yuan xing: Wo Ren yan jiu*,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0.
- 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Zhou, Shaoming (Joseph P. McDermott) zhu, He Chaohui, yi. *Shu ji de she hui shi: Zhong hua di guo wan qi de shu ji yu shi ren wen hua*, Beijing: Beijing da xue chu ban she, 2009.
- 周積明，〈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清史研究》，第4期(北京，2004)，頁1-18。
- Zhou, Jiming. "Qian jia shi qi de han song zhi 'bu zheng' yu 'xiang zheng': Yi Si

- ku quan shu zong mu wei guan cha zhong xin*,” *Qing shi yan jiu*, di 4 qi (Beijing, 2004), 1-18.
- 孫青，《晚清之「西政」東漸及本土回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 Sun, Qing. *Wan qing zhi 'xi zheng' dong jian ji ben tu hui ying*, Shanghai: Shanghai shu dian chu ban she, 2009.
- 章可，〈論晚清經世文編中「學術」的邊緣化〉，《史林》，第3期(上海，2009)，頁68-74。
- Zhang, Ke. “Lun wan qing jing shi wen bian zhong ‘xue shu’ de bian yuan hua,” *Shi lin*, di 3 qi (Shanghai, 2009), 68-74.
- 章清，〈「策問」中的「歷史」——晚清中國「歷史記憶」延續的一個側面〉，《復旦學報》，第5期(上海，2005)，頁53-62。
- Zhang, Qing. “‘ce wen’ zhong de ‘li shi’: Wan qing zhong guo ‘li shi ji yi’ yan xu de yi ge ce mian,” *Fu dan xue bao*, di 5 qi (Shanghai, 2005), 53-62.
- 章清，〈中西歷史之「會通」與中國史學的轉向〉，《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2005)，頁75-95。
- Zhang, Qing. “Zhong xi li shi zhi ‘hui tong’ yu zhong guo shi xue de zhuan xiang,” *Li shi yan jiu*, di 2 qi (Beijing, 2005), 75-95.
- 章清，〈傳統：由「知識資源」到「學術資源」——簡析20世紀中國文化傳統的失落及其成因〉，《中國社會科學》，第4期(北京，2000)，頁190-203。
- Zhang, Qing. “Chuan tong: You ‘zhi shi zi yuan’ dao ‘xue shu zi yuan’: Jian xi 20 shi ji zhong guo wen hua chuan tong de shi luo ji qi cheng yin,”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di 4 qi (Beijing, 2000), 190-203.
-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 Peng, Minghui. *Wan qing de jing shi shi xue*, Taipei: Mai tian chu ban she, 2002.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譯，《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 Fu dan da xue wen shi yan jiu yuan, yi. *Jing xue, ke ju, wen hua shi: Aierman zi xuan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0.
- 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 Feng, Tianyu, Huang Zhangyi. *Wan qing jing shi shi xue*, Shanghai: Shanghai she hui ke xue yuan chu ban she, 2002.
- 黃東蘭主編，《新史學第四卷·再生產的近代知識》，北京：中華書局，2010。
- Huang, Donglan, zhu bian. *Xin shi xue di si juan: Zai sheng chan de jin dai zhi sh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0.
- 葉純芳，〈孫詒讓《周禮》學研究〉，臺北：臺灣東吳大學博士論文，2006。

- Ye, Chunfang. "Sun Yirang *Zhou li xue yan jiu*," Taipei: Taiwan dong wu da xue bo shi lun wen, 2006.
- 葛兆光, 《域外中國學十論》,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2。
- Ge, Zhaoguang. *Yu wai zhong guo xue shi lun*, Shanghai: Fu d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2.
- 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7。
- Qian, Mu. *Zhong guo jin san bai nian xue shu shi*,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97.
- 謝放, 〈中體西用——轉型社會的文化模式〉,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3期(武漢, 1996), 頁1-8。
- Xie, Fang. "Zhong ti xi yong: Zhuan xing she hui de wen hua mo shi," *Hua zhong shi fan da xue xue bao (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di 3 qi (Wuhan, 1996), 1-8.
- 羅志田, 《權勢轉移: 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 Luo, Zhitian. *Quan shi zhuan yi: Jin dai zhong guo de si xiang, she hui yu xue shu*, Wuhan: Hube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9.
- 羅檢秋, 〈清末古文家的經世學風及經世之學〉, 《近代史研究》, 第6期(北京, 2001), 頁21-54。
- Luo, Jianqiu. "Qing mo gu wen jia de jing shi xue feng ji jing shi zhi xue," *Jin dai shi yan jiu*, di 6 qi (Beijing, 2001), 21-54.
- 關曉紅, 〈終結科舉制的設計與遺留問題〉,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5期(廣州, 2011), 頁9-21。
- Guan, Xiaohong. "Zhong jie ke ju zhi de she ji yu yi liu wen ti," *Zhong shan da xue xue bao (she hui ke xue ban)*, di 5 qi (Guangzhou, 2011), 9-21.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Jingshi*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Sun Yirang's Studies on the "Rites of the Zhou"**

Xu, Jia-gui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Past studies on the ideological trend called *Jingshi* (statecraft)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mostly centered on the history of schools of thought, or were equated with specific analyses on proposals for reform and policy analysis. With a focus on Sun Yirang's academic career in the "Rites of the Zhou,"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Jingshi* was a widely used term that justified *xue* (learning) at the level of *zheng* (administration) and hence overcame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the schools of learning. The term also induced a vision attributing administrative chang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and then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fate of learning itself. In comparison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a common path of self-fulfillment for the literati,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altogether of a limited scale. Furthermore, the literati (*shi*) were regarded in principle as officials or quasi-officials instead of scholars, which made it practically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xue* from *zheng*. Alth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the accuracy of learning and through it the correctness of administration, ultimately it was only able to see *Jingshi* through a muddy lens. Compared with the self-evident legitimac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research was vague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avoid questions about its practicability, especially with the arrival of Western learning. Although its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Jingshi*, their in-depth research was considered as separate from the analyses of the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exts and the society, the related ideological transition in modern China could be viewed in a direct and multi-dimensional way with this research.

Keywords: *Jingshi*, Confucian classics, textual research, Sun Yirang, “Rites of the Zhou”